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"九五"规划重点课题研究成果

K295.1
X68a2

SHANGHAI TONGSHI WANQING ZHENGZHI

上海通史

熊月之／主编

第3卷

晚清政治

熊月之 袁燮铭 著

上海人民出版社
Shanghai Renmin Chubanshe

A0909474

China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第一章　鸦片战争与上海开埠

1840年,英国为了打开中国市场,藉口所谓禁烟问题,发动了蓄谋已久的侵华战争,史称鸦片战争。战争第一阶段,英军欲入广州而未果,进攻厦门亦未得,乘虚袭占浙江定海,然后驱舰北上天津海口,向清廷施加压力。道光帝态度由硬变软。时为1840年。这一阶段,战争规模不大,与上海没有多少关系。第二阶段,广州方面时和时战,英国不满足清政府允诺的议和条件,先攻广州,继占厦门,再于1841年10月占领浙江的定海、镇海、宁波。这一阶段,战争与上海也没有直接关系。第三阶段,1842年3月,英军在浙江沿海打败清军,离开宁波,继续北犯。5月18日,攻占杭州湾北部的军事重镇乍浦,5月28日,向吴淞驶来。6月8日,英舰侵入长江吴淞口外,两江总督牛鉴派人向英军求和,江南提督陈化成坚持抗战。16日拂晓,英军进攻吴淞炮台,从此揭开了吴淞之战的序幕。中英吴淞之战是上海历史的一个转折点,此后两个多月,《南京条约》签订,上海被确定开埠;一年以后,上海正式开埠。

China

一　吴淞之战

吴淞防务　吴淞在上海北部，宝山东南，为黄浦江与长江汇流入海之处，是上海县门户，松江府的屏藩，长江防御的第一要塞。这里向为兵家所重，明嘉靖年间已设副总兵镇守，清朝改设参将驻防。中英战争打响后，吴淞成为江苏设防重点。两江总督牛鉴亲来此处布防。他得悉乍浦失陷以后，亲自巡视江湾、杨行、宝山、吴淞，在吴淞口修筑海塘，拨兵把守。新任江南提督陈化成，住在吴淞口军营中，日夜巡逻，修台筑炮。吴淞兵力部署情况如下：

黄浦江东岸，东炮台位于川沙境内，连同东岸土塘共有火炮 20 位，驻兵 1000 余名，由川沙营参将崔吉瑞、游击董永清率领。其余川沙临海地带，因地形复杂，不利船行，故未布置太多兵力。

黄浦江西岸，位于宝山境内，从南至北，新月堰炮台设炮 10 位，西岸土塘设火炮 134 位，陈化成率参将周世荣驻此指挥，土塘之后设有营帐，驻有接应部队；宝山县城设大小火炮 50 位，驻兵 2000 名，牛鉴驻此督率；宝山城西北约 3 里许的小沙背，驻兵 700 名，由徐州镇总兵王志元督率，防止英军从侧翼绕袭。另外，在东西土塘之间的黄浦江面上，布有一些师船、民船，以防英军直入内河。吴淞防务的总指挥牛鉴(？～1858 年)，字镜堂，号雪樵，甘肃武威人，嘉庆进士，累官至河南巡抚，1841 年 10 月擢两江总督。因他并无带兵经历，所以防务方面的事，只能倚恃陈化成。

按照牛鉴等人的设想，英军如果闯入吴淞口内，东西两岸土塘的守军埋伏不动，俟彼炮火将竭、大船临近时，众炮环发；英军如果以舰船掩护步兵登陆，守塘之兵可以尽出，用虎蹲炮、抬炮、鸟枪连环夹击；英军如果绕攻小沙背一带，我已层层设炮，节节埋伏；英军如果闯

过吴淞口，直入内河，则黄浦江上部署的师船、民船一齐出击迎战。这样，无论英军怎么来攻，我都应付裕如，胜券在握。他向皇帝报告：

> 由西炮台而至宝山县城之东门，土塘约有六七里之长，其深港又较远四五里，处处有炮，即处处可击，处处并有接应之兵，彼亦断无飞越数丈壁立之高岸，豕突犯我之理。再由东门以至小沙背一带，深港去岸已有十余里之远，此处止有豫备陆战，截其来路，而我兵已层层设炮，节节埋伏，（朱批：卿能如此豫备，必奏殊勋，朕忧怀稍宽矣。）彼不能携带大炮犯我内地，虽有火枪火箭，亦断不能敌我之大炮抬炮，与夫百余尊虎蹲炮位，此理亦不辨自明。且我之火箭喷筒毒火之类，均已豫备齐全，堪资得力。[1]

对于这样的布置，陈化成也感到没有问题，自称“经历海洋几五十年，海上防御全凭炮力。此身在炮弹中人死出生，难以数计。刻下布置精密，可打胜仗”。[2]

战争经过　进犯吴淞的英军有战船 8 艘，武装轮船 6 艘，运输船 13 艘，运送陆军约 2000 人。统帅为英国驻华海军司令巴加（W. Parker），旗舰为“皋华丽号”。这支军队，船坚炮利，装备精良，了解吴淞的防守情况，熟悉清军的作战能力，挟从广州到厦门再到浙江沿海的连胜之势，进攻吴淞，是他们沿江西进、压服清廷的重要一环。

6 月 8 日，英军驶进长江口以东之鸡骨礁，侦察吴淞的防务情况。13 日，巴加率舰队抵达吴淞口。16 日，巴加根据天气和海潮情况，决定对吴淞发起攻击。清晨 6 时半左右，英军采取将轮船与战船绑在一起的办法，由“谭那萨林号”拖“布朗底号”及“北极星号”，“西索斯梯斯号”拖“皋华丽号”，“复仇神号”拖“摩底士底号”，“弗莱吉森号”拖“哥伦拜恩号”，“伯鲁多号”拖“克里欧号”，以其他船舰作为后应，向吴淞炮台进攻。其中，“皋华丽号”与“布朗底号”是两艘吨位最大的战舰，分别配炮 72 门、42 门，充当先锋，直驶吴淞炮台正前方。

面对悍然来犯的英军,陈化成下令发炮回击。一场激战发生。一个参战的侵略分子记载:

(中国军队)始终打得很凶猛,我方战舰在指定地点停妥后始行回击;双方连续炮战达两个半小时。……我方舰队自与中国军队作战以来,中国人的炮火以这次为最厉害。我军旗舰被击中多次,后樯被击中三炮,"布朗底号"被击中十四次,希威特海军中尉在甲板上被一颗炮弹击中而阵亡。"西索斯梯斯号"被击中十一次,其他舰只也都被击中多次。[3]

陈化成在发炮回击的同时,出动几十艘兵船和大型明轮船,在江面上与英军作战,但由于武器落后,射程远不及英军,没能给敌军以有效的打击。

中午 12 点后,英运输船载运陆军部队在吴淞西岸登陆,兵分两路进攻宝山县城。驻守在宝山县城的牛鉴,在战争打响后,率兵出南门督战,途中遭英军炮击,随兵被毙十余人。他退回宝山,城中居民已尽逃散,遂向西逃往嘉定,后转太仓。驻守在小沙背的王志元,原拟率兵往宝山应援,听说西岸土塘失守,亦率兵西撤。已成孤军的陈化成,与敌人进行殊死搏斗,终于牺牲。

吴淞之战,英军被击毙 2 人,伤 25 人。清军阵亡 88 人,除了陈化成,知名的还有守备韦印福,苏州人,曾署金山营守备,先于陈化成战殁;把总龚龄增,崇明人,战死于乱军之中;千总钱金玉,在危急时刻,有人劝逃,他勃然大怒说,"我年十六食国饷,今焉避害",终于战死;外委许林、许攀桂、徐大华等,均壮烈牺牲。

吴淞抗英之战中,牺牲得最为壮烈的是陈化成。他是福建同安人,1776 年生于书香门第,22 岁入伍当兵。精通箭法,擅长武功,"蹋壁则直上五寻,涉水而能游数里",多次参加征剿海盗,屡立战功,累官至总兵、提督。1839 年在福建水师提督任内,率兵多次发炮抗击英船,翌年初调任江南提督。到任后,积极备战,筑炮台,修土塘,与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塘,……而公拔佩刀接仗,枪亦洞腹。时在塘仅有三人,公呼投效武进士刘国标曰:"我不能复生,汝急免我首,掷体沟中!"一恸而绝。[4]

67岁的老将,在战场上流尽了最后一滴血。刘国标冒着弹雨,将陈的尸体背到炮台附近的芦苇丛里掩藏起来。10天以后,人们在



图1-2　陈化成像

China

塘,……而公拔佩刀接仗,枪亦洞腹。时在塘仅有三人,公呼投效武进士刘国标曰:“我不能复生,汝急免我首,掷体沟中!”一恸而绝。[4]

67岁的老将,在战场上流尽了最后一滴血。刘国标冒着弹雨,将陈的尸体背到炮台附近的芦苇丛里掩藏起来。10天以后,人们在



图1-2　陈化成像

China

芦苇丛中将尸体找出，运到嘉定，在武庙入殓。道光帝下诏优恤，在其故乡和死难地建立专祠，赐谥“忠愍”。赐其子陈廷芳承袭世职，陈廷棻赏给举人。对于这位上海近代史上第一位民族英雄，上海人民一直怀着深深的敬意，立祠，树碑，赋诗，作文，以各种形式纪念他。上海县城、宝山都有陈公祠。

吴淞抗英之战的失败，固然有多方面原因，牛鉴等人临阵慌乱，措置失当；各炮台之间没有密切配合，形成合力等，这些都是重要方面，但武器的粗劣落后，制度的腐败是失败的根本因素。据研究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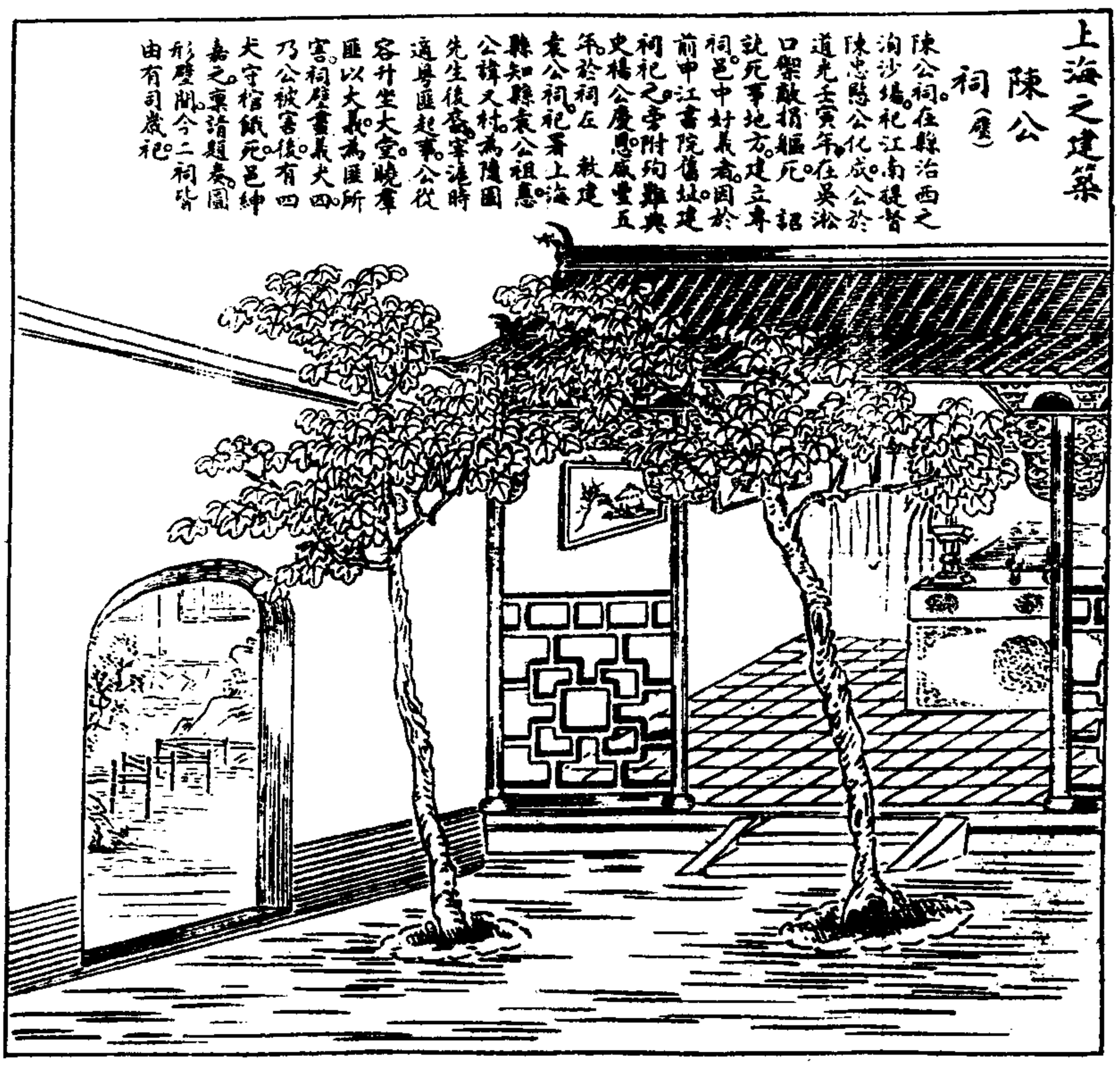


图 1－3　陈公祠

China

吴淞炮台所用大炮,还是明末清初来华西洋传教士所帮助制造的那种类型,与英军所用大炮,在技术、性能上相差二百年。清军制度不适应近代战争,驻守东炮台、西炮台、小沙背的军队,分属不同系统,事权不一,指挥不灵。再加上清军官员腐败,贪污兵饷,炮弹、子药以劣充好,"我军炮子多砖心,比至贼船而灰,炮门且裂,全塘震动"。[5]

上海失陷 英军占领吴淞和宝山以后,很快决定向上海进发。他们得到情报说,上海居民正忙于搬运财物,如果去迟了,会无法得到清政府的赎金。6 月 19 日,英军分水陆两路,进犯上海。陆路由蒙哥马利中校率炮兵、工程兵、地雷队等一千余人,自江湾、新闸人上海北门;水路由水兵、海军陆战队组成,乘"北极星号"、"摩底士底号"等 8 艘战舰和轮船溯黄浦江而上,停靠在南码头。英军海军司令巴加等则乘"麦都萨号"停在黄浦江上。

上海县城方面,因无险可守,一触即溃。苏松太道巫宜禊在宝山失守的第二天,从上海县城取走一些银两、军火、文卷等,借口将这些东西解送松江府城而离开了上海,并不打算抵抗。上海知县刘光斗,典史杨庆恩,守备王嘉谟,千总徐朝栋,在县城防御。负责上海防务的右营游击封耀祖,带同千把外委王振邦、洪家声、刘殿华、姚玉成,在离县城五里临江的李家厂炮台防御。英军经过此地时,发炮轰塌炮台,封耀祖等败退,避地泗泾。李家厂即日后英国领事馆所在地。据说,英军占领上海县城以后,知县刘光斗投水自尽,漂至下游,被人捞起获救。典史杨庆恩,大概是上海县城里唯一以身殉职的官员。这位绍兴人,在英军进入县城以后,因阻止别人释放狱犯而未成,愤投黄浦江而死。据说,他的死很有点戏剧性。他在决定自杀以后,家人已散,仅一仆人追随左右。他取出一根金钏付仆,仆力辞,再劝方受。深夜,呼船夫摆渡过黄浦江,船夫索价 1000 文,还价 500 文成行。船至江中,他整衣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正冠,对船夫说:“适许诺渡钱,来世付汝可乎。”言毕跃入中流。第二天,仆人在南码头附近寻到他的尸体,无钱入殓,最后卖掉金钏,才得棺以殓。这段故事,给不攻而克的上海,多少涂上一点悲壮色彩。道光皇帝表彰杨庆恩:“捐躯殉节,情殊可悯,著交部照例赐恤。”[6]

至于城内百姓,在吴淞之战打响以后,便已纷纷逃难,秩序大乱:“肩舆夫扛络绎,邪许之声,至不辨市人言。午后闻吴淞口失守信,人皆窜城外。奸民载道,白日抢掠,西北二乡更甚,抛男弃女、呼爷觅母之声,惨不忍听。”[7]因此,英军抵达上海时,眼前已是一座空城。英兵记载:

> 当我军进抵上海北门口时,那边显然没有准备进行什么抵抗,我们看到城门口仅有的两门大炮,对于我们似乎也不足为害。实际上,城门口已经找不到一个中国兵。我军派出两三名士兵,设法爬过城墙,把城门打开,其余的士兵也就由此进了城。我们这时才知道,中国地方当局于前一天晚上,已经离开了这个地方。[8]

英军占领上海以后,英军首领鉴于上海城市的繁荣和在商业上的重要性,决定不让这个城市遭到抢掠。他们发布安民告示,内称:“大英国大宪谕上海居民知悉:照得本国与百姓,毫无战意,最可彼此和睦,广开通商之路,大有益矣。但大清官不要议和,是以有衅端也。此次本地匪类,乘机抢夺官民,诚属痛恨甚矣。此后该匪再敢抢劫,本官宪从重治罪,不稍宽贷。”[9]江苏巡抚程裔采在向朝廷的报告中,也说英军在宝山、上海两县“掳掠无多,并无伤人及奸抢妇女之事”[10]。但事实上,抢掠之事仍时有发生。一个上海文人在日记中记下了英兵入室勒索的情况:

> 比及门,已有数洋人持械破门。予念家眷在,纵死不宜两地,挺身阻之,为所执。入室,倾箱倒箧,凡一切银钱首饰、细而

软者,虽微必攫。迨抄掠毕,以刃加予颈,索蓄藏,曰"番饼番饼"者良久。予力告以困苦状,且手示之,得释。又至侄居,予应之,洋人略搜数处,皆书籍,舍而去。又至族叔少园门,予亦启之,搜如前。又叩砂雨兄居,予出户往应之,匪各笑指而去,门勿入也。是日至者凡数队,大率如前状。[11]

英军还冲入一些著名园林,抢劫古董。为了补充食品,英军采取以食品换护照的办法:"洋人于邑庙给大英护照,取之者必只鸡易,无鸡则一切食用物,亦或有得之者。"[12]凡得到护照,贴于门首,英兵即不再骚扰。

6月22日,英国全权公使璞鼎查(Henry Pottinger)到达上海,决定沿江而上进攻南京。23日,英军全部撤出上海。退出前,英军向清政府勒索了30万元的所谓"赎城费",这笔钱后来计算在《南京条约》的赔款项内。24日,游击封耀祖从泗泾返回上海,傍晚抵达上海,城门已闭,这位临难出逃的武官觉得太没有脸面,收起了往日的威风,竟在城外露宿一夜,第二天才进城。6月27日,苏松太道巫宜禊返回上海。

上海县城被英军占领了5天。这5天,给上海县城内的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。英军抢劫、勒索,当地土匪乘机行事,抢、奸、烧,社会一片混乱。人民能逃则逃,不能逃者昼不敢行,夜不敢寐,妇女更是到处躲藏。有文字记载了英军占领上海县城第一天的情景:

薄暮,道无行人,家无吠犬。凡人家之藏躲者,概不敢举火,三更造饭,终日寒食。予忧不成寐,中夜危坐,但闻四野号泣之声,随风吹至。城上怪声时起,懔人毛骨。又以城门不闭,宵小横行,愍不畏死之徒,手械入室,俨若主客。[13]

第二天、第三天,抢劫之风更盛:"土匪如故,而又生出一种抢掠者。盖乡人数十成群,遍掠当铺、各铺及殷户,而城中无赖亦三五成群要

于路，名曰抱不平，择其物之破恶及书籍等付之火，其金、银、铜、锡火不能毁并衣物之值钱者，自取之，汹汹然俨一仇敌，而诸洋人又伺于其侧，以择取焉。此风一起，遍地皆然。”[14]

英军可恨，土匪可恶，官府可耻。在他们交互作用下，上海人民遭受了空前的浩劫。值得指出的是，在这一灾难中，上海一些士绅表现出临危不惧、保卫家园的可贵气概。如前所述，在英军占领上海前两天，英军撤出上海的后两天，上海县城都出现了一段政权空白点，土匪猖獗，秩序混乱，县城的一些士绅挺身而出，担当起维护社会秩序的责任。人称“姚老师”的上海县学教谕姚某，自称“谈天之老学究”的曹晟，在文武各官逃走的当天，6 月 17 日，即四处安民，劝谕开店，组织铺户男丁巡逻，弹压土匪。英军退走以后，他们将残留在城中的铺丁组织起来，分别防守各个城门。晚间，规定各家各户出油烛，燃灯于街，以壮声势。大南门有土匪百余人，半夜叩门行劫，经曹晟等率众吓退。其中，姚教谕的形象最为可爱，他不但出面维持秩序，而且临难不避，令英军敬畏：

> 学师姚公，苏人也，为郡学教谕，兼署上邑教谕，不一月而洋人至……公取库中祭器书籍及册籍匿深处，而自退于忠义祠，曰：“斯二字可爱也。”有以通稟请者，公曰：“我非不冀升迁，然危人自安，我不为。”洋人搜得之，公端坐曰：“我官也，将何为？”洋人中有能华语者问：“何官？”公曰：“教官。”问：“掌兵多少？”公曰：“无兵。”又问：“何司？”公曰：“司教化。”洋人肃然退。食顷复至，致渠意，请至邑庙相见。公叱之曰：“我与若曾有相见事哉？无已，有死耳。”洋人知不能屈。[15]

这就是气节。古人云：“文臣不爱钱，武臣不惜死，天下太平矣。”上海武有陈化成，文有姚教谕，虽然未得太平，但在这页猝然翻开的屈辱历史中，多少透出一点亮丽的色彩。

二 上海开埠

英国派来的代表团

1842年8月29日,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《中英南京条约》签订。条约第2款规定:“自今以后,大皇帝恩准大英国人民带同所属家眷,寄居大清沿海之广州、福州、厦门、宁波、上海等五处港口,贸易通商无碍。且大英君主派设领事、管事等官住该五处城邑,专理商贾事宜。”这就是五口通商的条约依据。

通商五口名单都是英方提出来的。在谈判时,中国代表耆英等对福州是否开埠问题,与英国代表讨价还价了一番,对于上海则一口应允。在耆英等人看来,上海在此前已被英军占领过,虽已退出,但军事要口仍泊有夷船,如不应允,英国势必再来攻夺,“与其任彼占据,孰若归我土地与之通商者”。既然允其通商,则“举凡设领事,立夷馆,住家眷,势不能遏其所请”。[16]

《南京条约》对于通商问题只作了原则规定,1843年10月8日订立的《中英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》即《虎门条约》,对此作了比较具体解释,第7款写道:

> 在万年和约内言明,允准英人携眷赴广州、福州、厦门、宁波、上海五港口居住,不相欺侮,不加拘制。但中华地方官必须与英国管事官各就地方民情,议定于何地方,用何房屋或基地,系准英人租赁;其租价必照五港口之现在所值高低为准,务求平允,华民不许勒索,英商不许强租。英国管事官每年以英人或建屋若干间,或租屋若干所,通报地方官,转报立案;惟房屋之增减,视乎商人之多寡,而商人之多寡视乎贸易之衰旺,难以预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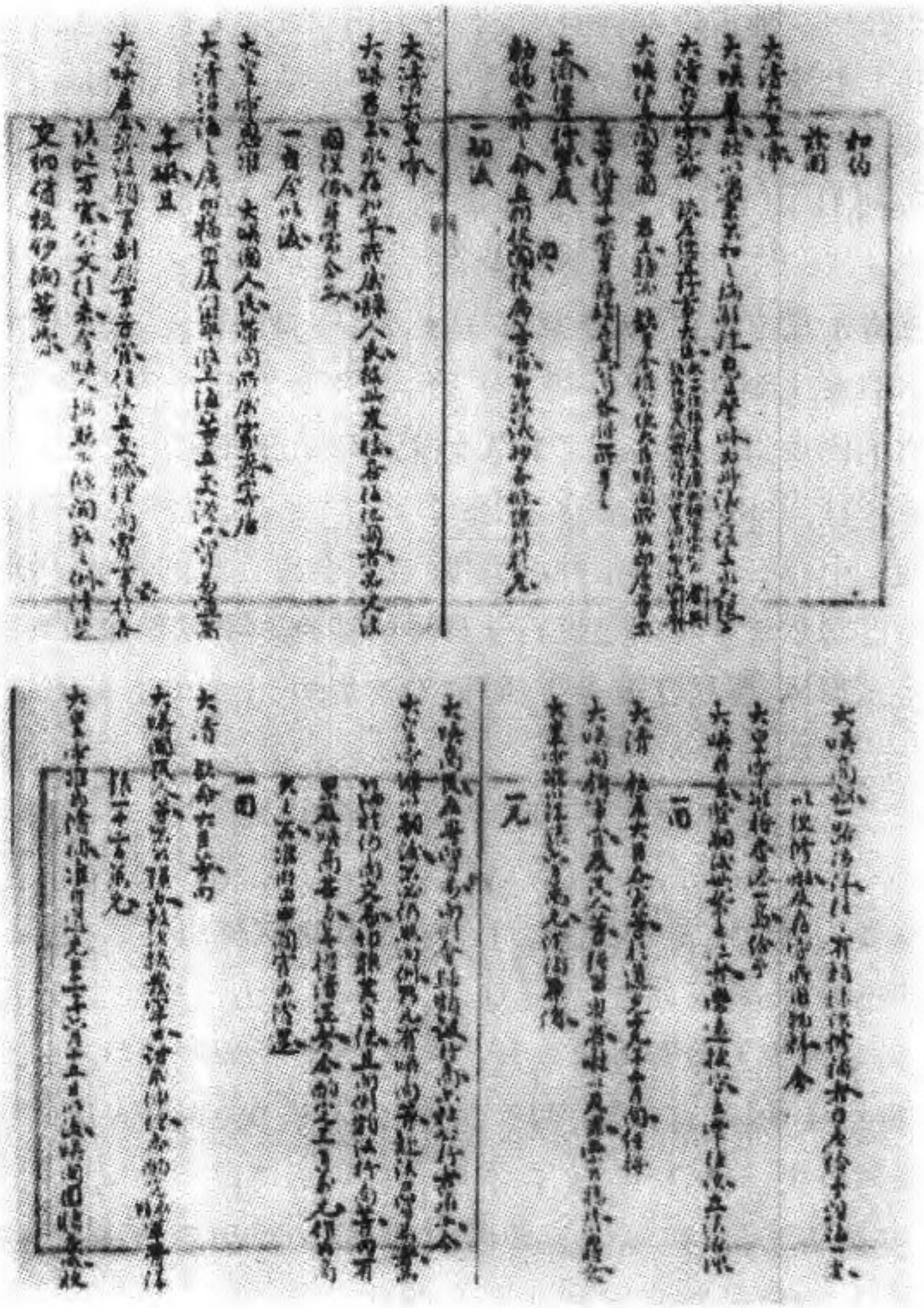


图 1-4　中英《南京条约》

额数。[17]

根据这些条款，英国派来的第一个代表团，于 1843 年 11 月 8 日来到上海。为首的巴富尔（George Balfour，1809～1894 年），原在印度马德拉斯陆战队，14 岁入伍，官至上尉，虽然只有 34 岁，但已有 20 年

的工作经历。他被璞鼎查看中,于1842年12月1日,被正式任命为英国驻上海第一任领事。其他成员有:麦华陀(W.H.Medhurst),著名传教士麦都思之子,翻译,日后成了第九任英国驻沪领事。海尔(Frederick Howe Hale),外科医生和助手。斯特拉钦(A.F.Strachan),职员。

巴富尔从广州乘"威克森号"船出发,在舟山转乘"麦都萨号",于11月8日晚上到达上海。第二天,他们拜访了苏松太道宫慕久,逐一介绍了代表团的成员。宫慕久率文武随员在海关为巴富尔举行欢迎宴会。11月10日,宫慕久到"麦都萨"船上,礼节性地回访了巴富尔。随员中有一位叫陈福勋的,日后成了会审公廨的谳员。随后,宫慕久与巴富尔就开埠问题进行了具体的谈判。中方参加谈判的人还有参将侯攀凤、署松江府徐青照、同知沈炳垣、上海知县蓝蔚雯。

英国领事馆的设立:上海正式开埠

宫慕久接待巴富尔,比起11年前吴其泰接待胡夏米,判若天渊。同是苏松太道,前倨如彼,后恭如此,这不仅因为形势的剧变,条约的制约,而且因为上海开埠的事宜,直接联系着清朝中央政府的中枢神经。《南京条约》签订以后,两江总督、江苏巡抚、苏松太道的位置变得越来越重要。1843年10月,实际全面负责清政府外交的钦差大臣耆英,奏请将亲信、四等侍卫咸龄改为候补道,留在江苏参与外交。11月7日,也就是巴富尔到达上海的前一天,清政府宣布咸龄以候补道身份,随同总督、巡抚办理外交,排名在宫慕久之前。耆英对咸龄相当赏识,在保举时称赞他"文义通畅,事理明白,遇有委办事件,不避艰险,能耐劳苦,随机措置,各得其宜。年余以来,深得该员之力,各国夷人皆极信服,于案牍素称谙练,吏治亦能有条不紊"[18]。谕称:五口通商章程初定,头绪纷如,一切事宜,须明干之员随同督抚

办理,江苏着璧昌、孙善宝督同咸龄、宫慕久核实办理。委派咸龄这样一个干才参加办理上海方面的夷务,可见清政府对上海问题的重视。在宫慕久接待巴富尔时,江苏巡抚孙善宝一直呆在宝山附近,密切注视着事态的发展。他只是考虑到自己品第太高,没有直接参加与英国人的谈判。他认为,领事只是夷商头目,级别较低,由四品官道台出面接待,比较合适。宫慕久,山东省东平州人,出身书香门第,1819 年中举,以后在边陲云南当过小官,但无办理外交的经历。1843 年 5 月被任命为苏松太道,7 月到任,1847 年擢江苏按察使。他办事沉稳,识大体,所以被保举到苏松太道这个重要位置上来。他的前任颜以燠因与英人交涉通商问题,被指控所出告示"含糊不明"、"措词未协"而被撤职。这也是他格外谨慎的原因。他到任后,对于与英国人打交道相当小心。他提议译员沈炳垣为松江同知,以买办吴健彰为随员,蓝蔚雯为上海知县,侯攀凤为参将。这些人原来社会地位都不高,据说这样做是为了降低与外国来往人员的品级[19]。英国人对宫慕久印象不错,说他"温文尔雅,思想开明"[20]。从事后对宫慕久办外交的评价,可以认为,宫慕久与巴富尔谈判的结果,都是得到江苏巡抚孙善宝首肯的。孙善宝在奏摺中写道:"伏思抚驭外夷,全在乎以恩信,俾其知感知畏,以期长治久安。该道宫慕久自莅任以后,即值办理通商事务,极形繁重,该道督同上海同知沈炳垣,筹办已将半载,情形日就熟悉,且其质直出于自然,廉介本乎天性,于华夷通商诸务,断不致徇私忘公,洵为实心可靠之员。"[21]

巴富尔与宫慕久讨论的首先是领事馆选址问题。宫慕久表示,县城内已经十分拥挤,找不到房屋,在县城外面,可能找到空房。翻译麦华陀认为,这种态度是出于上海地方政府的既定政策,其目的是要把外国人安排在郊外,以便监视。麦华陀看得很准。宫慕久主张领事馆设在城外,一是为了监视,二是减少麻烦,第三也是出于习惯。当时上海的惯例,来沪外省人的行会都被安置在城外,英国人也是外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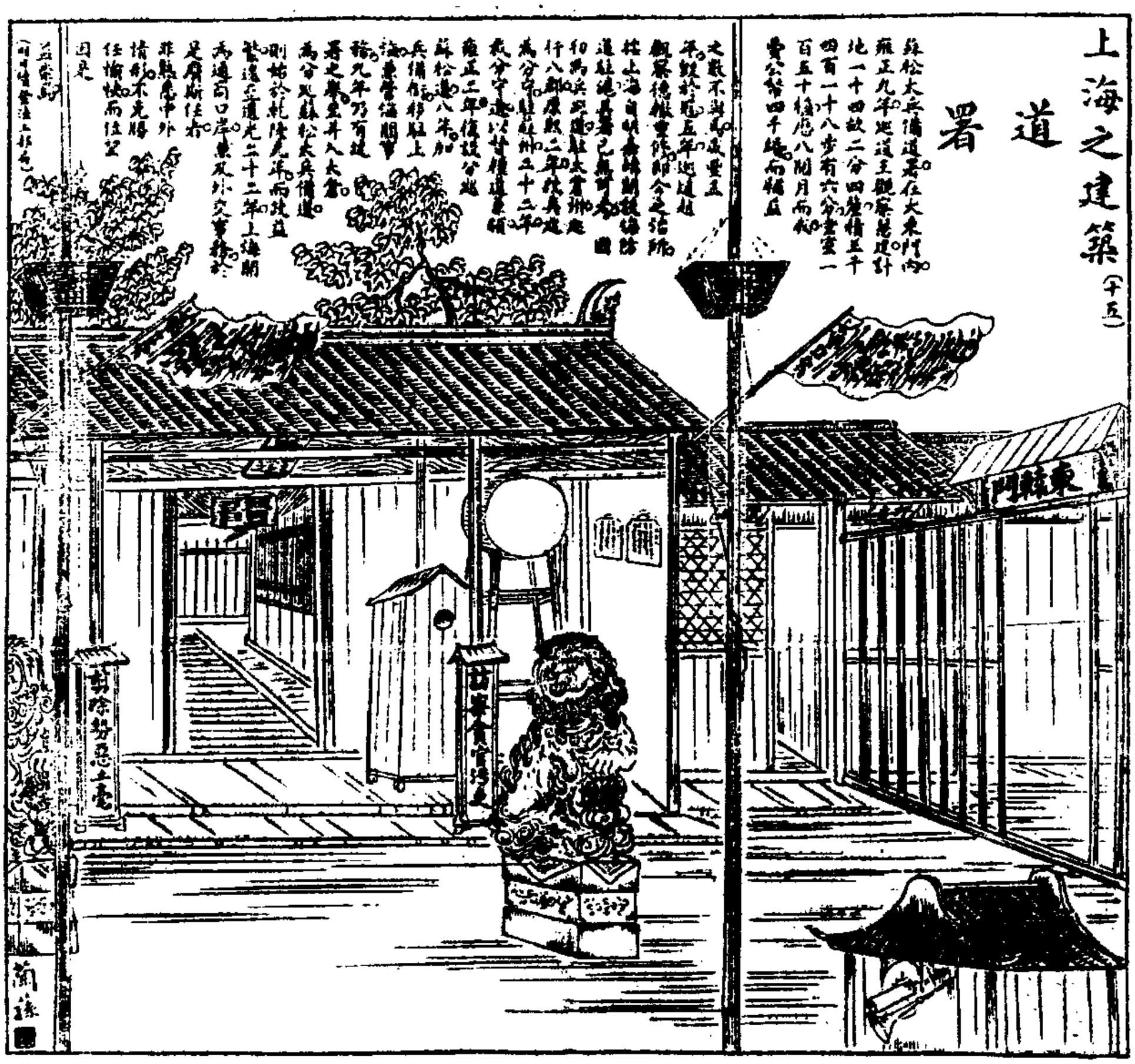


图 1－5 上海道署

来者，自然应在城外[22]。巴富尔不满意这种安排，强横地表示，他将自寻房屋，如果找不到，宁愿在城里庙宇的庭院中搭建帐篷来居住和办公，也许会搬到某位官员的家中去住。巴富尔等离开道台衙门以后，在街上有一个商人主动搭讪，表示可以为他们提供一所一流的宅第。此人姓姚，广东人，在沪经商。巴富尔接受了他的建议，住进了姚氏住宅。洋人初住上海，吃饭、喝水、穿衣等一举一动都有人围观。巴富尔撵走了好奇的围观者。1844 年 2 月，英国人从一个姓顾的那里租到一处住房，位于大东门西姚家弄，名敦春堂，坐北朝南，院子里有四幢二层楼房，上下共 52 间，有水井、厕所，押金 640 两银子，每年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China